

毛泽东政党外交的风格

■周玉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了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搞好国内建设,主张加强我党与外国政党的交流往来,建立双边或多边政党关系。政党外交实践体现了毛泽东处理政党外交的独特风格,即主张不同性质政党之间的包容与合作、注重党与党之间的独立与平等、追求政党关系的宽松与和谐、坚持对外援助的慷慨与无私、坚决反对大党主义。这些鲜明而独特的风格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今天的政党外交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政党外交;政党关系

[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4)04-0184-05

周玉文,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政法系副教授。(湖南娄底 417000)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改变世界政治格局,获得了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的尊敬和赞誉,树立了崇高的声望。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崭新的执政党,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走上了广阔的外交舞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出发,致力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壮大世界反霸权、反殖民的统一战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党外交工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及国际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展现了处理政党外交的独特风格,对我国目前的政党外交仍有指导意义。

一、提倡不同性质政党之间的包容与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采取敌视、包围、封锁的政策,并且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分野十分明

显,中国共产党总体上是以意识形态论亲疏,主要与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交流往来、相互支援,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我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是最主要的经常性的关系。

与此同时,为了建设新国家,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在政党外交中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提出了不同性质的政党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相互包容与合作的光辉思想。1954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说:“有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完全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1](P370)}1961年,毛泽东在和法国社会党一位领导人交谈时说:“西方国家和政党同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各种障碍只是暂时的现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障碍,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排除的。”^{[2](P17)}毛泽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一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他还进行了初步的实践,主要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民族主义政党进行了合作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增进了相互理解与支持,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不同性质的政党

之间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而进行的交流与合作,体现了毛泽东求真务实的开拓精神,为我们今天超越分歧广交朋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二、强调党与党之间的独立与平等

党与党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是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有利于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保持党与党之间的独立与平等更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量的团结和进步呢?毛泽东在处理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以及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关系中总结了一条宝贵的经验:独立与平等。

毛泽东认为,一个党真正的独立自主,是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必要条件。无产阶级政党基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利益,必须在世界的舞台上联合起来,互相支持,但是,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毛泽东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各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联合,同时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历史证明,如果不把两方面正确地统一起来,而忽视任何方面,就不能不犯错误。”^[3]独立自主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道路,要正确处理“学习借鉴与照抄照搬”的关系,照抄照搬是要犯错误的,强行要求别的政党采取同样的革命和建设模式同样不可取。1956年4月26日,毛泽东在向美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介绍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说:“有一点跟大家讲清楚,就是中国的经验只能做参考,照抄则不可,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4](P64)

无产阶级政党之间本质上是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即兄弟党关系。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平等的内涵是生动丰富的。首先,平等就是不分大小、强弱,执政党和没有执政的党在国际舞台上一律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声望空前提高,苏联共产党开始重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但苏共领导人却把执政党分为三六九等。比如,在1957年的莫斯科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苏联共产党开始只同意把大会宣言草案交给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讨论,不

给其他没有取得执政权的兄弟党讨论、表决的机会。毛泽东认为这样不妥,既然都是兄弟党,就应该有平等的知情权、讨论权、表决权,苏共只好同意了。这清晰地表明了毛泽东的平等思想。其次,平等就是互相尊重。毛泽东在抗美援朝中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等打交道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他们的党、政府和领导人,也得到他们的广泛尊重,建立了同志和兄弟式的深厚情谊。再次,平等还表现在对交往双方都有利,即平等互利。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本民族的先锋队,代表国家民族的利益,在政党交往中讲平等就要秉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不能只顾及本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损害别国民族和人民的利益。针对苏共曾经在政党交往中的民族利己主义行为,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1](P167)

三、追求政党关系的宽松与和谐

建立什么样的政党关系模式,对各国政党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道路、推动世界进步都是十分关键的。毛泽东认为,党际关系宽松而和谐,会有力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采用了相对宽松的政党联合形式,第三国际和情报局采用的是以苏共为中心的高度集中的政党联合形式。

毛泽东深刻总结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共产国际和情报局的一些经验,发现了共产国际和情报局的一些弊端,坚决反对采取高度集中的以某个政党为中心的政党关系模式,主张各国政党间建立宽松而和谐的党际关系,认为最好采取双边或多边协商对话机制来实现各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和统一。列宁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在理论上已经蜕变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在实践上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发动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表明第二国际已经失去了先进性和革命性。于是,列宁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国

际,领导和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共产国际采取了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实际上变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由于苏共和共产国际不了解该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指导各国的革命斗争中做了许多错误的指示,比如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很多指示,几乎断送中国革命。二战后,为了协调欧洲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统一行动,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苏共自封为最高指导者,要求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按苏共的旨意行事,在国家建设上强行推行苏联模式。南斯拉夫共产党在铁托的领导下探索适合南斯拉夫本国国情的建设模式,拒绝照搬苏联模式。苏共随即指责铁托为民族主义者,对南共大加挞伐,于1948年6月将南共开除出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恶劣影响。在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毛泽东则主张通过广泛的、平等的协商达成共识,反对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方式达成一致,得到了许多兄弟党的赞同。他对国际组织心有余悸,并在会议上说:“我们不赞成成立国际组织,像情报局那样的机构也不赞成。历史证明,搞国际组织是没有好处的。”^[5](P1174)]可见毛泽东主张的党际联合形式不是高度集中而是相对宽松且和谐的形式,这样的形式既有利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和行动,又有利于各国独立自主地搞好本国革命和建设。

四、坚持对外援助的慷慨与无私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个鲜明特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是无产阶级在思想和政治上由自在转向自觉的充分体现。在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团结、联合、支援了全世界的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向法西斯、不民主的制度猛烈开火,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心里不仅装着中国人民,也装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他认为,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下获得了兄弟党

和国际正义力量的巨大支持和帮助,已获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工人党,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其他国家人民。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形势跌宕起伏,国际环境异常险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西方殖民者和反革命势力互相勾结,企图包围、封锁乃至扼杀朝鲜、越南、中国等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针对这一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各兄弟党互相配合,互为犄角,相互支援,才能稳住人民革命力量的阵脚,抵挡帝国主义势力的疯狂进攻。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列席中共八大的兄弟党领导人时说:“全世界的兄弟党、人民的对头是美帝国主义,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战线砍断它的一支手。砍断它的一支手,我们就舒服一点,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障碍。”^[4](P131)]各兄弟党深表赞同,在战略配合上保持了高度默契,有力地打击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战争势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朝鲜、越南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无私援助,其中抗美援朝直接消耗战费60亿元人民币,加上欠苏联的军火债30余亿元,总计90余亿元人民币。中国先后出兵297万人,中华儿女在朝鲜战场上做出了巨大牺牲。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给越南提供了包括武器弹药、给养、干部训练甚至服装在内的系统支援,按当时的币值计算达200多亿美元,实际上成了越南的战略大后方和后勤基地。当然,援助是相互的,朝鲜、越南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英勇斗争,极大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对势力,巩固和扩大了社会主义和人民革命力量的版图,为中国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战略缓冲区。

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毛泽东也给予积极支持。1951年4月,毛泽东收到尤金的一封信,希望我们向设在罗马尼亚的旨在援助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的布加勒斯特基金组织捐款15万美元,毛泽东欣然赞同,并批转周恩来落实。据师哲回忆说:“周总理委托我交过两次,1951年交了15万美元,1952年只多不少。”^[6](P481)]对外援助既帮助了受援国的人民和政党,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和中国在国际地位。

当然,就毛泽东对外援助的力度而言,对朝鲜、越南的慷慨援助完全是正确的,既是保家卫国的需要,也是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要求,试想没有中国的无私援助,朝鲜和越南都有成为美国殖民地的危险,而我们则完全有可能处于美国构建的包围圈中,我们的国际环境就更加险恶。当然,在对外援助的过程中,也有值得我们总结和思考的经验教训:如何处理对外援助和量力而行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对外援助没有考虑自身的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自身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当时对阿尔巴尼亚的巨额援助,养成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依赖和懒汉思想。时任中国驻阿大使耿飚就阿尔巴尼亚使用中国援助的状况给中共中央写过一封信,毛泽东看过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实际上就是对阿的援助提出了自我批评。

五、反对大党主义的一贯与坚决

毛泽东在处理政党关系中是非常尊重兄弟党及其领导人的,在许多兄弟党中具有极高的威望。毛泽东始终在政党外交中坚持一个原则,不怕强权,不欺弱小,这与当时苏共所体现的大党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老大哥,指导和帮助了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也给予了巨大支持。但是,苏共领导人斯大林、赫鲁晓夫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常常以救世主自居,表现出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干涉兄弟国家、兄弟党内政,强迫兄弟党服从自己的战略、采用与自己相同的政治经济模式,伤害了很多,甚至出兵占领兄弟国家,引起了许多兄弟党的不满。面对苏共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毛泽东不信邪、不怕压,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因此,一贯、坚决地反对政党关系中的霸权主义鲜明地体现在毛泽东处理政党关系的实践当中,成为毛泽东处理政党外交的一个突出特色,展示了他“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风范。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其实质就是苏共与波兰、匈牙利党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苏共在布达佩斯以武力干涉匈牙利统一工人党内部事务,在波兹南以武力威胁波兰共产党。苏共试图以这种方式解

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改变兄弟党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布局,影响极其恶劣。毛泽东派刘少奇、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协助苏共解决波匈事件,并批评苏共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行径。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交谈时,点名批评了苏共的老子党习气,认为以某一个党为中心的状况应该改变,“由老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家长制度”^{[4](P64)}。这些话表达了当时所有受过苏共压迫的兄弟党的共同心声。

1958年4月,苏方建议在我国建立长波电台,共同投资和使用,但没谈及所有权问题。毛泽东既考虑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合作,也考虑到我国国防情报安全和主权问题,做出了积极回应,同意建立电台,但必须由中国出资,所有权也必须归中国。苏方对此置若罔闻。后来毛泽东又通过彭德怀向苏方明确表达了我方立场,苏方仍不理不睬,苏共的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大党主义的傲慢态度令毛泽东感到愤怒。7月21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遵照赫鲁晓夫的指示向毛泽东提出,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既不谈如何组建,也不谈指挥问题,毛泽东坚决拒绝。22日,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对尤金说:“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也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我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张到中国的海岸,是要控制我们。”^{[7](P172)}尤金感到事态严重,急电苏方通报毛泽东的反应,赫鲁晓夫得知后极为震惊,亲自来华向中共中央解释,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对赫鲁晓夫说:“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最后我再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愿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的目的!”^{[8](P98)}这些话表达了我党反对霸权主义的严正立场。

毛泽东对其他受苏共压迫的兄弟党也给予积极声援。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杜布切克在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掀起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苏联出动30万军队解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武装,并占领捷克全境,以古斯塔夫取代杜布切克,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毛泽东强烈谴责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干涉捷共的霸权主义行径,最终与苏共彻

底决裂。毛泽东对反对苏共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兄弟党及其领导人也予以赞赏,1975年在会见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时,盛赞“铁托是铁,不怕苏联压迫”。

毛泽东不仅坚决反对苏共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行为,而且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出现了一些偏差,宣传“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思想红遍全球”等不适当的话语,毛泽东认为这是强加于人,要求马上纠正。毛泽东同情和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们的解放斗争,但他始终坚持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观点,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履行的国际义务与输出革命严格区分开来,别国人民革命与否必须由他们自己决定,革命的时机、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是否成熟均要由该国人民自己把握,不能人为地制造或阻止革命,否则就是强加于人。

六、结语

毛泽东在政党外交中艰辛开拓,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舞台,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展示了他处理政党外交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既体现了他作为的伟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也体现了他运用外交策略的高度灵活性;既体现了他的铮铮铁骨,也体现了他的儒雅大度;既体现了他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夙愿,也体现了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谋解放,摧毁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雄伟抱负,这与当时大搞民族利己主义、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一些苏共领导人形成了鲜明对

比。毛泽东以独特的风格处理政党外交赢得了外国政党、政要和人民的赞赏,使中国共产党驰骋在世界广阔的外交舞台,广交朋友,广结善缘,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外交战线上的伟大胜利,政党外交功不可没。毛泽东的政党外交实践及其外交风格,对我国当前的政党外交仍具有指导意义,他用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敢于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才能有效地维护国际正义、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推动世界和平,否则我们在国外舞台上的正义就难以伸张,世界将永远是强权的天下。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 [3]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N].人民日报,1956-12-29.
-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5]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 [6]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 [7]张树军.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外交实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 [8]韩漳.中南海外交珍闻录[M].太原:山西高校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赵 伟】